

从三个“教徒世家”看基督教 对城市家庭的影响

——兼论城市基督徒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影响

张丽萍

[摘要]本文选取四川城市三个著名教徒世家,探索家族的谱系,追踪基督信仰的起因、背景,对基督教在家族内的下传关系、以及在姻亲中外延过程,加以分析描绘;对家庭中的重要人物,关于他们“学界代表”、“宗教领袖”、“社会精英”等头衔,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怎样的演变中收获的,据此对城市基督徒在社会阶层中的角色地位加以评价。

[关键词]基督徒;家庭;城市;家谱;人生观

中图分类号: B9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3)02—0084—06

作者简介:张丽萍(1965—),女,重庆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会大学史及基督教史。四川成都 610064

导论:三个家庭与四个教派

清咸丰十年(1860)后,西国教士“依约”取得内地传教的权利,基督教新教各教会纷纷进入偏居内陆的四川。到1910年,根据四川洋务局统计,在川新教徒达36823人^{[1](P.231)}。他们有的来自书香之家,有的是城市平民,有的是乡村农民。他们有的是因“贫”从教(即所谓吃教的“米教徒”),有的是因学从教,有的是因商从教……。在不同的机缘下,他们有的因入教而谋生、谋职,有的因教而出国、留洋,有的因教而为商、为绅……这些极具历史价值的人生旅途也因其过于繁杂而不受关注。加之长期以来基督徒所带有的“另类”、“异类”的标签,与正统意识形态不合,他们的基督徒身份往往不为历史书写者注明(如辛亥革命中的基督徒革命者),而教徒们对其历史的缄默也成为政治冲击下的“后遗症”,“文革”时期大量个人书籍、家谱的焚毁,一系列违心的“揭发”、“批判”材料的出笼,使关于基督徒的资料既少且难辨真假,人们对基督徒家庭的发生、演变缺乏完整的认识。

本文选取的三个四川家庭,其家族人物涉及了四个差会^①,有的还是差会的重要人物。杨氏家族就是公谊会在四川的一个重要家族。杨家及姻亲人物中,不仅是公谊会、美以美会在四川的开拓

者、领导者,也是著名的教育、经济人物。宋氏家庭,系从官绅世家转为教徒世家的一个典型,是圣公会在四川的著名家庭。乐氏家庭是由商绅转变为基督教家庭,其子女及姻亲人口庞大,尤其汇聚于医药行业,对四川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百年的时间,一个家族少者衍生四五代人、多者七八代人。自杨国屏(1902年)、宋诚之(1919年)和乐家从乐伯英(1900年)成为各自家族第一代基督徒,三家已经分别繁衍至第五代、第六代。从表象上,杨国屏、宋诚之、乐伯英均为家族中的第一代教徒,然而他们也有一定的区别:从教的时间杨、乐两家在清末,宋家在民初,几乎相差一代,而且以杨国屏、乐伯英所代表的第一代教徒为该差会的最早的教徒之一,而以宋诚之所代表第一代教徒则已经是该差会的次生代教徒。基于家庭内部的亲缘感召,杨、宋、乐三家的子辈、孙辈,均成为天然的第二代、第三代教徒,他们二代同堂或三代同堂,因而组合成完整的基督之家。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剧烈的政治变革、社会中阶层地位的彻底转换,其中的第一代教徒纷纷在1950年代去世。而跨越新旧时代的第二代教徒,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必须要在揭发和批判中与“帝国主义分子”划清界限,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又回归礼拜堂,并从事在政府法律范围内的宗教活动、外

事活动。而这三个家庭的第四代,有着与先辈迥然不同的理想与追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基督教教徒。

一、个案:从杨、宋、乐三家看基督教对人生和家庭的改变

(一) 杨氏家庭:上流的基督教家庭

1. “贵格革命者”——一个基督徒的出身与早期经历

“据信孙中山首届内阁的大部分成员是基督徒。孙的副总统黎元洪强烈要求应让更多的传教士来中国,并深入尚无教会活动的内地省份。”^{[2] [P. 464]} 此话反映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基督徒(大多数是新教徒),在平等和民主精神的激荡下,参与了晚清的革命,其中的不少人成为中国新一代的领袖。四川也如此,有的是反清起义的地方领袖,有的还成为大汉军政府的官员。杨国屏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的基督徒,如史籍所记:

(1911年)初六日(十月)午前,(杨)开甲与(杨)培栋至各领事公署,宣布四川独立各节情形,并在咨议局将发辫剪去,表示为大中华民国之代表,向各领事宣布独立之事。^{[3] [P. 542]}

文中的杨开甲(字少荃,1862-1943)、杨国屏(字培栋,1882-1956),均为基督徒,同为成都青年会的创始者,又一同秘密参加革命党。大汉军政府成立后,四川外务司由“二杨”掌管,司长为杨少荃,秘书由杨国屏担任。

一本外国人的著作《公谊会在中国》(*Friends to China*)就称杨国屏、杨开甲为“贵格革命者”:

1905年霍德进(Hodgkin,英国传教士)到成都从事青年会和公谊会工作,霍氏想在四川物色一个领袖——有助于公谊会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教徒。最初,他选择的是杨国屏,他是1902年毕业于重庆广益学校的四个学生之一,现正在青龙街教书。是一个受学生爱戴的品德高尚的人,并且他“对未来工作带来极大的希望”。杨国屏教霍德进中文,而霍教他生理学,后来送他到天津学习青年会的管理工作。

其后,霍德进发掘出另一个更价值的人——杨少荃。他出生在中国的中心武昌,是第三代基督徒,他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从事邮政工作,1905年转回到他喜欢的教书职业。尽管当时他对教会的兴趣已经减退,霍把他介绍给杨国屏和陶维新(Robert J. Davidson,英国传教士),他们成为最好的三个朋友,1909年他加入公谊会,并很快成为华西最有影响的教会领袖,担任

四川公谊会主席多年。

在晚清背景下,受西式教育的新教徒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羡慕,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同情者、响应者甚至领导者。下面我们根据杨氏家谱及历史档案,回顾杨国屏这个农民子弟如何以他“离经叛道”、“犯上作乱”的选择,走上了一条与先辈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杨国屏祖上是福建客家人,清康熙年间移民四川璧山县虎溪河,到杨国屏时已是第七代。兄弟姐妹9人中,杨国屏是男嗣中年纪最小的。爷爷虽是位武秀才,但父亲早逝,母亲无力供他上学。公谊会为他提供了免费教育的机会,他就靠教会的资助和为学堂做义工,完成了学业。1902年20岁的杨国屏从重庆广益书院毕业,留校任教,并协助四川公谊会创办人之一陶维新在四川各地传教,成为公谊会的开拓者之一。

1910年,杨国屏与外国传教士霍德进、陶维新及中国人杨少荃等人,发起成立成都基督教青年会。期间,会长杨少荃、干事杨国屏参加了同盟会,暗中从事反清革命。

1910年12月23日,成都青年会建筑落成,赵尔丰总督出席典礼。其时,杨少荃任青年会主席,杨国屏任干事。人们至今仍然纳闷总督大人赵尔丰是否知道“二杨”都是革命党人、同盟会员——几乎就在一年后,这些革命党就让这位总督送命。对此秘密,霍德进和陶维新的确是毫不知情的。革命活动以嘉定小学为中心,杨少荃在那里教书。在1911年初,他俩帮助一个受通缉的革命党逃出城,花一大笔钱买下他的命。也许,杨少荃、杨国屏与革命党人的这种关系甚至两年前就有了。^{[4] [P. 98]}

1914年,杨国屏受公谊会的派遣去英国留学深造,后又游学美国。他不仅学习神学,还攻读了社会学、工业建设等课程。1916年学成归国,受聘为重庆中西德育社干事。该社由陶维新创办,传播基督福音,介绍西方文化,很快便成为重庆上流社会的社交沙龙。

2. 跻身上流社会

辛亥革命期间,杨国屏交往于尹昌衡、胡文瀾等军政首脑、外国领事和牧师之间,如鱼得水。其子杨振华口述称“辛亥革命前后,当他在成都青年会作干事时,他认识很多人,满清和民国的官僚、军、政、商、学各界的人都有。”^③他与上流社会的紧密关系,并不为变幻的政局所动摇。1920年代,他参与了一系列有军阀背景的银行工作。

1930年代后,因其亲家的关系,与国民政府的要员保持私交,如杨国屏长子杨振华结婚时,便邀请四川省主席张群做证婚人。

与政界和教会的良好关系,他广交朋友的个性,以及对工商业管理的爱好,促使他几度置身于金融界。1919年他入股重庆大中银行2000元,并为成都分行经理,开始了他的商海沉浮。对此,杨振华后来曾批评其父亲“为了追求更多的金钱和享受,脱离教会而转入重庆大中银行工作。”^④从1919-1936年十余年间,杨国屏活跃在四川金融界,曾先后参与组建三家商业银行(大中银行成都分行、成都汇康银行、重庆平民银行),但因政局动荡等原因均关门倒闭。

银行的倒闭,虽然对杨家一度有过打击,却无损杨家的根本。抗战前,杨家在重庆有院房三所,街房十余间,在成都灯笼街有院子一所,铺子十余间,在西较场有住房几间及周围的菜园十余亩。其它,还有重庆允丰正酒号股份二、三千元,成都启明电灯公司股份二千多元等。^⑤

3. 基督之家

家庭感化是中国教徒的主要发生模式之一,接受教义的中国人,扮演者使家庭(家族)基督化的“家庭传教士”的角色。基督信仰通过下传子孙,外延至宗族、姻亲,逐渐形成一个教徒世家(从清到民国,四川一些城镇和乡村,就出现了拥有数千人规模、同姓或同宗者聚居的天主教社区,主要得益于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时间长达250年。)

杨国屏的家庭中,恋爱结婚、子女教育、子女择偶等,都具有浓厚的基督教价值取向。杨国屏与李琼瑶自由恋爱,1910年结为伉俪,被称赞为四川“第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青年男女”。两人的结合,既是双方门当户对的评估结果,也是两人宗教观的契合:李琼瑶之父李立茂为私塾老师,其母李王氏早年居孀,有三女,李琼瑶为幼女。精明能干,在重庆经营水烟,挣下万贯家财,到20世纪20年代初,李王氏已有一百多家商铺。三小姐喜爱教会学校,选择广益女校就读,毕业后,即决定终身奉主。她结婚后随丈夫传教,到三台广益女校教书。1926年创办成都女青年会,任会长。

杨国屏夫妇生育子女四人:杨振华、杨绍基、杨煦春、杨梅先(半岁夭亡)。家庭宗教气氛的熏陶,从小就培养了他们的灵性信仰。杨振华谈到家庭的宗教影响时说“父母常以基督教公谊会所主张的无条件的极端和平主义来教我。”^⑥潜移默化中,基督徒在杨家的子女中诞生。

宗教信仰的取向,延续到了杨家的子女姻亲,结合出新的基督之家。杨国屏与张凌高所结之儿女亲家,可谓珠联璧合。1940年杨家长子杨振华与张家长女君儒结婚。张凌高(1890-1955),美以美会教徒,出生于璧山农民家庭,受福音堂教友培养,入教会学校就读,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后,被教会送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27年当选为华西协合大学校长。

杨国屏钟爱自己的侄女马婉如、马冠群。她俩先后就读于教会学校,为公谊会教徒。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杨国屏在教会圈中遴选了两位侄女婿:罗品三、方叔轩。罗品三(1889-1969),公谊会教徒、后任公益会年会主席。三台人,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与马婉如结婚,任三台公谊会博济医院院长、成都青年会会长,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校董及董事会主席。方叔轩(1893-1982),公谊会教徒、后任公益会年会主席。成都人,从华西大学毕业,1920年由公谊会送往英国留学,回国后创办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并任校长。方叔轩与马冠群结婚,1947年张凌高辞职后继任大学校长。

从某种意义上,杨家及联姻家族,是四川教会史上的一个奇迹:既是超教派的“协合”,也是上流人士的强强联合,张凌高、方叔轩、罗品三等家庭在四川声势显赫。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大家,其家族内部的基督化却非一帆风顺。英国教授伍德先生(Patrick Wood)在其所著*Time Will Make Thing Clear*中就描写杨家的尴尬局面:琼瑶之母李王氏及两个姐姐均非基督徒,而信佛教,1922年李王氏去世,老太太的丧礼严格按民间传统方式进行:

棺材安放在大堂,堂前供奉着古老的牌位,牌位刻着李家所有祖先的名字。用白花装饰灵堂,按照中国传统说法,由于是“喜丧”,所以棺木里外都漆了大红的油漆。花钱请来四个和尚,为老夫人念经超度亡灵。这个精心安排的丧礼,给李家的亲人以极大的慰藉,对信基督教的杨国屏和琼瑶却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又不能劝说李家人不要这样。^{[5](P.6)}

4. 精英——第二代基督徒的崛起

如果说杨国屏、张凌高代表四川的第一代基督徒,那么他们的子女就是通常所谓的“第二代基督徒”。相比之下,这些民国前后出生的新生基督徒有着与父辈迥不相同的社会背景和成长环境:血与火的仇教灭教只是留在先辈脑海中的噩梦而与他们无关,同时他们也被家庭、教会、社会寄予

了莫大的希望——光耀家庭、光大教会、服务社会等等。这批新生的基督徒中,杨振华及夫人张君儒可谓是代表性人物。加拿大学者文佳兰(Minden Karen Paule)曾在其所著《竹石》(*Bamboo Stone*)一书中,称杨振华、张君儒这批华西毕业的医生为“中国的医学精英”。

据说“振华”二字寄托了其父母对他的期许。杨振华的前半生几乎都是在安逸中度过:基督之家的宗教文化氛围、丰衣足食的上流生活、良好的教育,足以养成一个“贵族式的精英”。教会学校是他从幼年、少年到青年的唯一的也是最佳的选择,他喜爱教会学校是因为那里可亲的洋人、可以融入其中的宗教礼仪等。

幼年的我,随着父亲在成渝两地拓展事业,随着家庭在这两座城市之间迁徙。不过无论在重庆,还是在成都,我念的都是教会小学:重庆公谊会广益小学、成都公谊会广益小学、成都弟维小学、成都华美模范高小、重庆广益高小,从1917年启蒙,到1925年小学毕业,转学五六次。小小年纪的我居然对学校还特别挑剔,只喜欢上教会学校。1920年父亲到成都开办银行,我转学到公立的中城小学,上了三天学后,死活都不肯再去。我留恋教会学校的英文、体操,还有与家里气氛十分相似的唱诗、祷告。无奈父亲只得又将我转入成都青龙街公谊会的广益小学。^{[5](P.6)}

经过在华西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严格而专业的训练,他成为了一名“会看病又会教书”外科医生。他自身的、家庭的许多优势,让他在35岁时就成为华西大学医院的院长(1946年)。其时,岳父张凌高已经卸任大学校长,由表姐夫方叔轩继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振华长期担任着四川医学院外科主任的职务,并创建了胸外科。

杨振华的妻子张君儒,就读于教会学校,后随父亲迁来华西大学。1937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47年留学加拿大。她是一位知名的儿科学家,早年在成都惜字宫女医院工作,后来创办四川医学院儿科,擅长小儿腹泻的治疗。与杨振华一样,她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原属美以美会,与杨振华结婚后,便归属了公谊会。

5. 小结:培养精英与成为精英

公谊会是较早进入四川的教派之一,与其它差会比较,在教堂数量、传教士及教徒人数上,排位靠后,但是其在四川影响却相当大。其中既有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深度介入,也与教徒们大多为上流人士密切相关。公谊会特别注意发

展青年文人,被证明卓有成效。杨家人中,不少成为公益会的领导者、捍卫者,从1904-1949四川公会年会8任主席中,有4位就与杨家有姻亲关系。而在公谊会相关的机构组织中,杨家贡献尤巨。从公谊会与杨家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了近代史上教会与教徒共同利益的完美结合:即培养精英与成为精英。

(二) 宋氏家庭:坚守传统的基督之家

1. 书香之家

宋诚之(又名忠廷,1892-1955),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宋书臣曾在陕西充任县官,于清末迁居四川,赋闲成都。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宋蜀华在其回忆中称:

祖父书臣公,幼年家贫,刻苦自励,熟读经史。后以吏员入仕,晚年定居蓉城,与成都知识界多有交往。他长于诗文,尤以书法、篆刻闻于当时。^{[6](P.34)}

宋书臣育有二子,宋诚之、宋杰人。宋杰人(1910-1980),又名忠俊,为诚之同父异母之弟,后亦是圣公会信徒,曾任重庆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重庆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2. 宋诚之与圣公会

1919年,宋诚之加入中华圣公会,年届30岁。对其信仰的转变,有称,“因酷爱英文,接触教会人士较多,对基督教由好奇而探索,进而潜心研究,终于决心为实现博爱平等的基督精神而贡献力量。”^{[7](P.556)}而子女的口碑材料则称其乃是不满足于“专制黑暗家庭”而加入基督教。

宋诚之自幼好学,1909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后进入嘉定外国语学校、外交署译材养成所。因其精擅英语,毕业后即为多所中学聘为英文教员。1917年考入华西协成大学英文系,攻读英国文学。1927年至英国牛津、剑桥留学,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等,为成都知名的英文教授。

在华的新教派别中,圣公会素以“本色”教会为主张,注重由华人“独立经营”教会,曾先后在华开办了圣约翰大学、文华大学,以培养中国教牧人员。在华牧人员及教会的自传、自立、自养的“本色”道路上,四川圣公会步入前列。1928年宋诚之出任圣公会西川教区会长,1934年任四川教区和西川教区副会督、会督,直到1950年退休。宋诚之在任会督的17年中,凭借他的影响和著力践行,对于消除基督教在华差会的“西洋传习”,以及对于基督教义的“本色化”颇有建树。

3. 徘徊于耶、儒之间的宗教领袖

好学不倦的宋诚之自幼熟读经史,并打下了儒家经典的基础,青年时代又在“五洋学堂”华西协和大学就读,并在英国留学多年,博通古今、学擅中西,加之喜与文士相交,且以神学布道和文学教授为职业,“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与四处奔波访问各乡村牧区相比,他更乐于呆在大学的圈子里,事实上他把他作为主教的职责与教书结合起来。”^{[2] (P.516)}丰富的阅历及体验,使之成为一个将中西文化以及基督教教义加以融合贯通的代表人物。1944年在宋诚之刊载于《基督教丛刊》第八期的重要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信奉基督精神,崇尚中国文化,抵制西方礼俗,曾在教会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宋诚之说“余固信耶教,而深爱耶苏者,余又爱我国,及我国数千年文化。”在他看来,基督教应该与儒家思想找到沟通的桥梁,“余研究信任基督教,三十余年矣,每日读经祷告,未尝间断,愈研究愈觉大道精深,于国于人有益,且与吾国孔孟之道,毫不冲突。”他甚至指出“耶苏之教义,亦即孔孟之大道。”^[8]

这位对“西方文明”相当了解的中国人,对于欧美风俗——尤其是其中所谓的“灭绝孝道”之俗,一直是抱着轻慢和不屑的态度,指出它们的虚伪和无情,而认为儒家孝悌之道乃是“几千年立国立人之高尚文化”,若能推行于全球,则能化暴戾为慈祥。他告诫世人说,欧美社会制度及家庭制度,“非本耶稣教义”,“离基督大道甚远”,以此将基督教与西方的风俗、制度划清界限。

作为圣公会会督,宋还挺身反对教会“礼仪之争”——“基督教禁人拜偶像,统一人生,乃其大功,大有贡献于我国,而教会禁人祀祖,灭人根本,乃其大罪,大有害于我国。”在分析了基督教百年传教的得失后,认为教会禁止教徒祭祖的做法,实为“灭绝人伦”,因此喊出了祭祖“万不可废”的口号,在当时的教会人士中引起了较大的反思。

宋诚之娶妻刘芷君。芷君为官宦之女,信基督教,曾任成都女青年会会长。宋诚之夫妇生育有7个子女,每周全家老少均做礼拜。宋家的子女,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分别毕业于华西大学、燕京大学、四川大学,有的还留学海外。在解放后,他们也成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

(三) 乐氏家庭:名人基督徒之家

1. 地方名士

乐伯英,四川雅安芦山县人,清朝武举人。乐

家为地方望族,祖上数人系清朝武举人和武将。乐家兄弟三人,长伯英(和州)、次作舟(和济)、三熙宇(和澗,“兄弟手足情深,长成亦未分家”,经商致富,在芦山、雅安、成都等地经营“义丰全”老字号水烟生意和茶庄,也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成都春熙路所开办的四川天然橡胶公司的领导成员。

伯英所娶藏族人邱福,系康定48家锅庄中地位显赫的邱家锅庄庄主之女。其爱好文学,曾告诉子女:乐家是宋代名将岳飞之后,为避秦桧寻缉,改姓为乐,还将“精忠报国”定为家训。

2. 乐伯英与浸礼会

雅安地区为美国浸礼会在四川的重要传教区之一,该教区开设于1894年。1900年传教士夏时雨(H. J. Openshaw)到雅安传教,结交上层社会,并加入袍哥组织,自称“夏大爷”。芦山县颇具实力的商贾乐伯英就是他尽力拉拢的人物,同年乐伯英等十余人加入基督教。

乐伯英入教后,尽力发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推动教会的扩展。1906年他承首在芦山陕西馆办蒙养小学堂。不久又以自家东街房子作教会礼拜堂,取名真道堂,附设小学,并交教会接办,更名真道堂小学。还尽量发动乐姓家族子女进入雅安教会小学,学生毕业后又陆续升入中学或神学校,或升入成都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有的还送到国外留学。

在教会雅安仁德医院的筹备和建设过程中,作为传教士的中国同事,乐伯英贡献良多。1900年柯礼思(Briton Corlies)筹建雅安仁德医院,在修建之初,“即同教徒乐伯英秘密策划,建院经费统交乐伯英亲手管理支配,从建筑材料,工人开支,乃至零星杂务,都由乐一手按照密谋行事”^{[9] (P.172)}。他还将医院款项投入乐家开设的裕丰厚商号内,经营生利,为医院筹集资金。该医院于1905年动工兴建,1906年建成二层楼西式砖房一幢,为西医药在雅安传播基地。

作为地方精英,乐伯英为地方教会的发展贡献了财力和心力,而基督徒的身份,则对他的经商业起到了的助力。乐氏商号、田产广布于芦山、雅安、成都,富甲一方。居住在碉楼中的乐氏家族,名震边城。

3. 乐家子女“博士之家”

在家族中,乐伯英承担着家庭传教士的角色,先是让其两个弟弟入教,后又令乐家子女都成为基督徒。据乐伯英二女儿乐以成回忆“我自幼九岁时,父亲命我入雅安浸礼会福音堂受洗,成为基

督徒。”^⑦

乐家第二代对父辈的基督徒身份充满了崇敬、感激。“我们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性情刚正不阿，治家严谨；经常对子女讲解朱柏庐治家格言及历代名人嘉言懿行、故乡风土掌故，教育子女懂得爱国爱乡和做人的道理。并规定子女年满10岁，就要帮助家事，做些洒扫的劳务。”^{[10] [P.37]} 得益于乐伯英的教导，乐家子女“不靠祖业要靠自立，声光化电，农林医师各精一门”^{[11] [P.57]}。据统计，乐家仅“以”字辈18个子女中，就有13人是大学生，其中出国留学的3人，获得博士学位的4人，获得硕士学位的1人，被誉为“博士之家”。他们中就有被誉为“空中赵子龙”的抗日英雄乐以琴，有“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之称的中国著名妇产科学家乐以成。

二、城市基督徒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影响

近代四川的基督教教徒中，乡村教徒的人数远超过城市教徒。然而，城市基督徒相对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和地位、相对较广的社会关系，以及宗教信仰带给他们更加开放的思想意识，使他们不仅对家庭、社区、社会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们初步统计的四川教会领袖人物中，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各个教会机构、组织里，大多都是城市基督徒。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农村，在其个人和家庭的“城市化”的过程，他们已经转化为城市基督徒。

如果说在20世纪初以前，教会事业基本上是由传教士一手掌控，在民初后，随着中国基督徒的成长和觉悟，中国人在教会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教会团体、事业中，中国人的地位显著提高，以宋诚之、杨少荃、张凌高为代表的中国人，为四川的教育、文化、宗教事业贡献良多。

（二）在发展经济、改造社会中的作用

由于接受教育的便利条件，加上教会在四川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因此城市基督徒及其子弟，几乎都有教会初级、中级教育的经历，其中的杰出者上到大学，甚至留学海外。“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药救国”的理念也深入他们的心底，在实践工作中他们有的成为建筑家、有的是教育家、有的成了医学家。

城市基督徒，深受西方宗教文化的熏陶，平等、博爱、宽容的信念使其思想更现代、更开放，如

对女子教育及工作的认识上，比传统家庭往往更为开明，在20世纪20年代，当社会舆论大肆非议“男女同校”、“女子教育”等，成都、重庆等地的基督教家庭已经培养出了女大学生。

（三）在沟通中西、传播文化中的作用

不论是清时中外的交涉、贸易，民国时期的与西方的交流交往，都不乏教徒活动的身影，抗战时期与西方学术机构的互访互动，1950年代初与西方友好人士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友好交流，这些人都起了不可缺少的“架桥”、“纽带”的作用。

注释：

①差会(missions)，系西方基督教会负责集资、派遣人员到国外传教布道的机构，近代在华差会(教派)有100多个，四川主要教派有8个：内地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公谊会、浸礼会、中会基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参见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9页。)

②③④⑤⑥杨振华《自传》(195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档案室藏：四川医学院人事档案。这份手稿是杨振华1955年所写，充满了他对家庭、个人的批评、谴责、剖析。

⑦乐以成《自传》(195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档案科藏：四川医学院人事档案。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G. F. S. Gray. 中华圣公会历史[A]//章开沅.基督教与中华文化丛刊[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杨开甲.辛亥革命川变写真记[A]//隗瀛涛.四川辛亥革命资料(下册)[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Charles Tyzack. Friends to China[M].York, England: William Session Limited, 1988.

[5]Patrick Wood. Time Will Make Thing Clear[M].The Sowl Press, 1999.

[6]邱永君.宋蜀华先生访谈录[A]//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7]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M].成都：巴蜀书社，1992.

[8]宋诚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J].基督教丛刊，1944.

[9]吴玉洁.美帝传教士在雅安一带的罪行[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Z].1981.

[10]乐以成,乐以钧.气壮山河的空军英雄乐以琴[A]//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2卷政治军事编)[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李永清.热心为桑梓教育服务的乐氏兄弟[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芦山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芦山县文史资料(第3辑)[Z].